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研究*

孙振嘉 崔浩男 宋雪雁 邓君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长春 130022

摘 要:[目的/意义]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分析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的影响因素,为提升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传播力提供借鉴和参考。[方法/过程]基于拉斯韦尔 5W 模式和问卷调查构建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假设模型,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和修正,并对修正后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模型进行讨论。[结果/结论]构建与申农通讯系统模型相契合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模型,全面讨论和分析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的构成,主要包括成果内容质量、成果外在特征、成果传播主体、成果传播媒介、成果受众属性、成果受众感知、成果传播环境 7 个维度的 32 个影响因素。

关键词:档案文献编纂 编纂成果 信息传播 传播影响因素
分类号:G274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0.03.002

1 引言

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1]。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传递信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传递、信息接收或信息反馈活动,而档案文献编纂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向受众传播真实、全面、系统的档案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就是档案信息的传播活动。档案文献编纂成果包括史书、人物传记、档案展览、文献纪录片、年鉴、大事记等,这些成果的传播加快了档案信息的传播速度,为档案机构提供了传播档案文化的良机,提高了受众接收档案信息的效率[2]。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档案文献编纂成果有限的传播渠道,为编纂成果传播力的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分析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完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原有的传播模式,进一步提升编纂成果的传播影响力和社会认知度,增加档案用户数量的同时实现用户下沉。

2 文献回顾

2.1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研究

通过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超星等文献库中以“(档案文献编纂 or 档案编研)and 传播”为检索式进行精确检索,可以发现当前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内容:档案文献的传播是一种有选择性的传播,利用者主动选择、利用者被动选择、自然选择促成了档案文献选择性传播的发生[3]。当前网络传播对档案信息传播造成了深刻的影响,通过对档案文化产品传播的调研,结合传播效度分析法可以发现,网络环境下档案文化产品的传播内容待改善、传播渠道不畅通、传播力量尚薄弱、传播反馈机制不健全,基于档案事业的社会职能应采取把握服务对象、疏通传播渠道、融合跨界力量、健全反馈机制等措施[4]。未来档案信息传播的发展将经历 4 个阶段,并最终形成一种新的复合型传播方式,即网络档案信息传播和传统纸质载体传播相互融合[5]。基于上述情况,有学者提出要构建档案信息传播学,以研究档案信息传播系统及其运行规律[6],并从编纂理念、传播模式与策略、社会化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大众文化传播视野下档案文献编纂要有全新的编纂理念,即受众理念、信息平等共享理念、综合效益理念、知识服务理念[7];基于传播学角度探析档案编研工作的性质,编研工作的信息传播模式应包括传者、档案编研内容、档案编研媒介、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与成果利用研究”(项目编号:18BTQ098)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孙振嘉(ORCID:0000-0002-5714-6380),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崔浩男(ORCID:0000-0002-1417-6774),硕士研究生;宋雪雁(ORCID:0000-0003-1955-6685),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E-mail:songxueyan@126.com;邓君(ORCID:0000-0002-3291-7193),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9-08-20 修回日期:2019-10-18 本文起止页码:12-22 本文责任编辑:王传清

受众、传播效果等方面[8]；档案编研成果跨屏传播的策略则包括发行网络、传播媒介和用户群三方面[9]；通过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具体分析档案编研工作社会化的途径，包含档案编研工作者、档案编研信息、信息媒介、受众和社会传播效果等要素[10]。此外，也有学者通过借鉴图书馆虚拟参考咨询服务的流程机制，将该服务移植应用于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传播过程中，包括异步参考咨询服务和实时虚拟参考咨询服务等[11]。

综上所述，当前研究虽然涉及诸多方面，但研究方法主要侧重于定性研究，在具体分析实践层面的问题时较多采用经验总结，缺乏数据支撑。因此，本研究拟通过定量分析丰富现有研究。

2.2 信息传播影响因素研究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本质上属于信息产品，对信息传播影响因素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的研究。通过在上述中文文献库中以"信息传播影响因素"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发现当前针对信息传播影响因素的研究方兴未艾，历年刊发的文献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并表现出理论性、时代性、多样性的特点。从理论基础上看，学者较多依托拉斯韦尔5W模式理论[12]、马尔科姆流行三要素理论[13]研究相关影响因素，也有部分学者采用信息传播四要素[14]、信息生态学[15]、米勒公众分层模型[16]、系统动力学[17]、计划行为理论[18]、使用与满足理论[19]等相关理论提取影响因素；从研究对象上看，主要针对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信息、网站信息、智库信息、电子政务信息的传播影响因素展开研究，体现出数字时代信息网络化的特点；从研究方法上看，学者们较多采用的方法包括回归分析[20]、探索性因子分析[21]、DEMATEL方法[22]、解释结构模型[12]、相关性分析[23]、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18]、情境实验[24]等。信息传播影响因素领域的代表性研究学者有刘行军、季丹、郭顺利、沐光雨等人。

通过对英文文献进行分析，发现该领域研究主题更多的聚焦于社交网络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研究内容主要有：L. Liu等基于微信分析了地理位置和距离对信息传播概率和速度的影响，结果验证了信息传播概率的距离衰减效应，证明了信息传播速度不依赖于地理距离[25]；S. Shan等基于信息传播理论和动机理论，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提出了信息源、信息和信息接收者3种传播要素，并通过在线调查问卷收集数据测试该模型，揭示了影响微信中雾霾信息传播的关键因素，提出在微信中发布公共紧急信息的决策框架[26]；J. Dong等通过计算实验探讨了信息吸引力和影响力以及信息来源对级联大小分布的影响，定量地揭示了计算实验中幂律级联大小分布的因果关系，阐明了信息吸引力、影响力和信息来源在社交网络中对流行度分布的作用[27]；X. Liu等将信息传播反馈机制引入信息传播模型中，提出了一种新颖的信息传播数学模型，并通过信息衰减系数和信息噪声系数分析信息传播过程的特征[28]。在政务信息传播影响因素方面，A. Navarro-Galera等通过对17个西班牙地区政府的实证研究，确定了对区域政府可持续性信息在线传播产生影响的因素，通过技术因素(宽带可用性等)和透明度刺激因素(可访问性等)能够增加在政府网站上发布的有关社会、经济和环境的信息量[29]。此外，R. P. F. Guine等运用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使用SPSS软件对影响青少年人群健康饮食信息传播的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30]。

综上所述，当前信息传播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有较强的理论支撑，研究对象结合时下热点，研究方法灵活多样，这些可以为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与支撑。

3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提取

3.1 影响因素的初步获取

拉斯韦尔(H. Lasswell)于1948年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信息的传播过程及其5个基本组成要素，即著名的5W模式，他认为信息传播过程是由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5个要素组成[31]。这可理解为信息传播过程包括传播主体、信息资源、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5个要素，但是该模式没有体现信息传播环境对传播过程的影响，特别是在数字时代下信息传播受到社会文化氛围、信息技术水平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更为明显[12]。数字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丰富为编纂成果传播提供了便利，因此本研究在借鉴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数字时代的特点，引入传播环境要素作为影响信息传播过程的组成部分之一，并通过文献调研初步提取29个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其具体释义见表1。

总体来看，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过程的影响因素包括编纂成果、编纂成果传播主体、编纂成果传播媒介、编纂成果传播受众、编纂成果传播环境。编纂成果作为传播的客体，是信息资源本身，包括印刷型(图书、

表 1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

序号	指标	指标释义
1	成果内容可靠性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内容是否真实可信
2	成果内容有用性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内容是否满足和匹配受众需求
3	成果内容丰富性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内容是否多样化
4	成果内容完整性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中与某一主题相关的档案内容是否全面完整
5	成果内容结构性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内容的层次、逻辑是否合理,档案内容的组织、整理是否结构化[15]
6	成果形式多样性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能否通过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进行呈现[16]
7	成果形式独特性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能否通过与众不同的形式进行呈现
8	成果创新性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内容和形式是否区别于现有的成果
9	成果社会性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覆盖范围,即面向的受众数量
10	成果易理解性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内容和形式是否被受众所易于理解
11	成果传播主体影响力[18]	档案文献编纂机构因其自身的规模、行政级别等获得的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
12	成果传播主体传播意识[32]	档案文献编纂机构和人员是否具有传播编纂成果的意识
13	成果传播主体推广能力	档案文献编纂机构和人员所具有的扩大编纂成果知晓和利用范围的能力
14	成果传播主体经费投入	档案文献编纂机构对编纂成果传播过程的经费支持
15	成果传播主体人员投入	档案文献编纂机构对编纂成果传播过程的人员支持
16	成果传播媒介影响力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媒介的权威性、知名度和影响范围
17	成果传播媒介互动性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媒介与受众的互动交流程度
18	成果传播媒介功能性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媒介自身功能设置的完整程度和功能作用的强弱
19	成果传播媒介安全性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媒介的安全可靠程度
20	成果传播媒介易用性	受众是否易于使用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媒介
21	成果传播媒介易获取性	受众是否易于获取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媒介
22	成果传播媒介易接受性	受众是否易于接受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媒介
23	成果传播受众基本特征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受众的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水平等个人基本属性
24	成果传播受众信息需求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受众对及时获取问题解决所需信息的要求程度
25	成果传播受众信息素养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受众所具备的信息意识、信息交流和获取运用信息的能力[33]
26	成果传播受众再传播行为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受众在接触和利用编纂成果后主动将其继续传播下去的行为[34]
27	政策法规环境[22]	国家主管部门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对编纂成果传播的影响
28	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中已形成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道德规范、审美观念和风俗习惯等对编纂成果传播的影响[35]
29	信息技术水平	网络技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应用程度

报纸、期刊等)、音像型(录音带、唱片、录像带等)、数字型(网络出版等)等类型,其内容可靠性、内容有用性、内容丰富性、内容完整性、内容结构性、形式多样性、形式独特性、创新性、社会性、易理解性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自身的传播;编纂成果传播主体是指信息的发出者,包括编纂机构及其人员,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担负着信息收集、加工和传递的任务,其影响力、传播意识、推广能力、经费投入、人员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编纂成果的传播;编纂成果传播媒介是指信息传播的渠道,是信息经过的中介或借助的物质载体,包括纸张、广播、电视、网站、社交媒体(微博、微信)等,其影响力、互动性、功能性、安全性、易用性、易获取性、易接受性对编纂成果的传播效果产生影响;编纂成果传播受众是指接受信息的人员或组织,是信息传播的最终对象和目的地,包括基本特征、信息需求、信息素养、再传播行为等影响因素;编纂成果传播环境指传播活动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和外在条件,包括信息技术水平、政策法规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

3.2 影响因素的修正

根据表 1 的 29 个影响因素在互联网上进行第一轮问卷调查,问卷发放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7 – 20 日,共收到 207 份问卷,将答案选择全部相同和答题时间过短(低于 1 分钟)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予以剔除,得到有效问卷 168 份,有效率为 81%。通过问卷中的开放性问题,收集在问卷中未涉及到的但受众认为重要的影响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的因素。通过整理分析

开放性问题的答案，去除在本质上与原问卷内容相同的若干因素，得到3个新增影响因素，分别为档案文献编纂成果时效性、档案文献编纂成果趣味性、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受众利用习惯与兴趣，见表2。修正后的影响因素充分体现了被调查者对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的认知与理解，证实了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表1和表2中32个因素的影响，为接下来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成为本研究构建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假设模型的依据。

表2　新增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

序号	指标	指标释义
1	成果时效性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是否仅在一定时间段内具有价值
2	成果趣味性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能否使人感到愉快，引起受众的兴趣
3	成果传播受众利用习惯与兴趣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受众自身利用信息的习惯和兴趣

4　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基于拉斯韦尔5W模式理论和问卷调查结果提出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假设模型，根据第二轮问卷调查数据检验结果对其进行修正，深度剖析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的层次性和重要程度。

4.1　假设模型的提出

根据表1和表2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释义，将32个指标划分为5个维度，即“档案文献编纂成果”“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主体”“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媒介”“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受众”“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环境”，构建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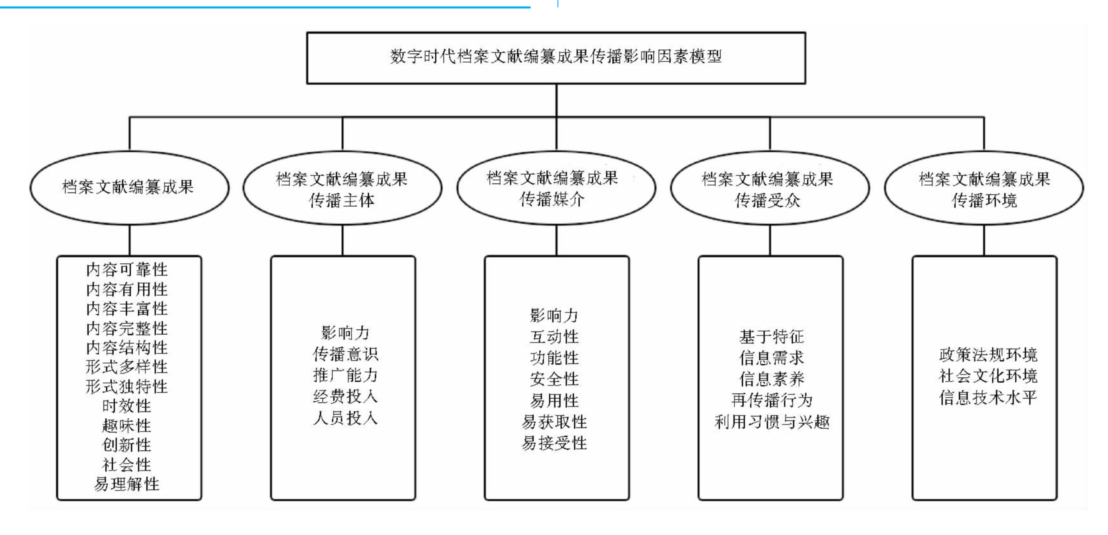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假设模型

4.2　数据采集与统计分析

4.2.1　数据收集整理

对第一轮问卷答案进行分析之后，本研究采用修正后的影响因素形成最终调查问卷，对假设模型的数据进行收集。最终问卷包含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情况和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重要性调查两大类内容。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调查中一共包含32个问项，均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其中1－5表示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大[36]。为避免重复作答，问卷对作答设备进行控制，限同一手机或电脑只能作答一次。问卷发放从2019年5月1日开始，持续一周时间，主要通过互联网进行在线问卷调查来收集数据，最终收集到325份问卷。将答案选择全部相同和答题时间过短（低于1分钟）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予以剔除，一共得到有效问卷280份，有效率为86.2%，符合预定样本规模。

4.2.2　样本特征分析

通过对280份有效问卷进行调查样本特征分析，结果见图2。调查样本的特征包括三大方面：①性别分布，可以看出被调查者性别比例差别不大；②年龄分布，18－30岁这一群体所占比例最大，为88.21%；③受教育程度，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以大学本科/专科和研究生为主，比例为94.64%，表明接受调查的样本人群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整体上看，样本以青年人群为主，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同时兼顾其他年龄群体，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4.2.3　观测变量描述性分析

利用SPSS 24.0对280份有效问卷的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各个观测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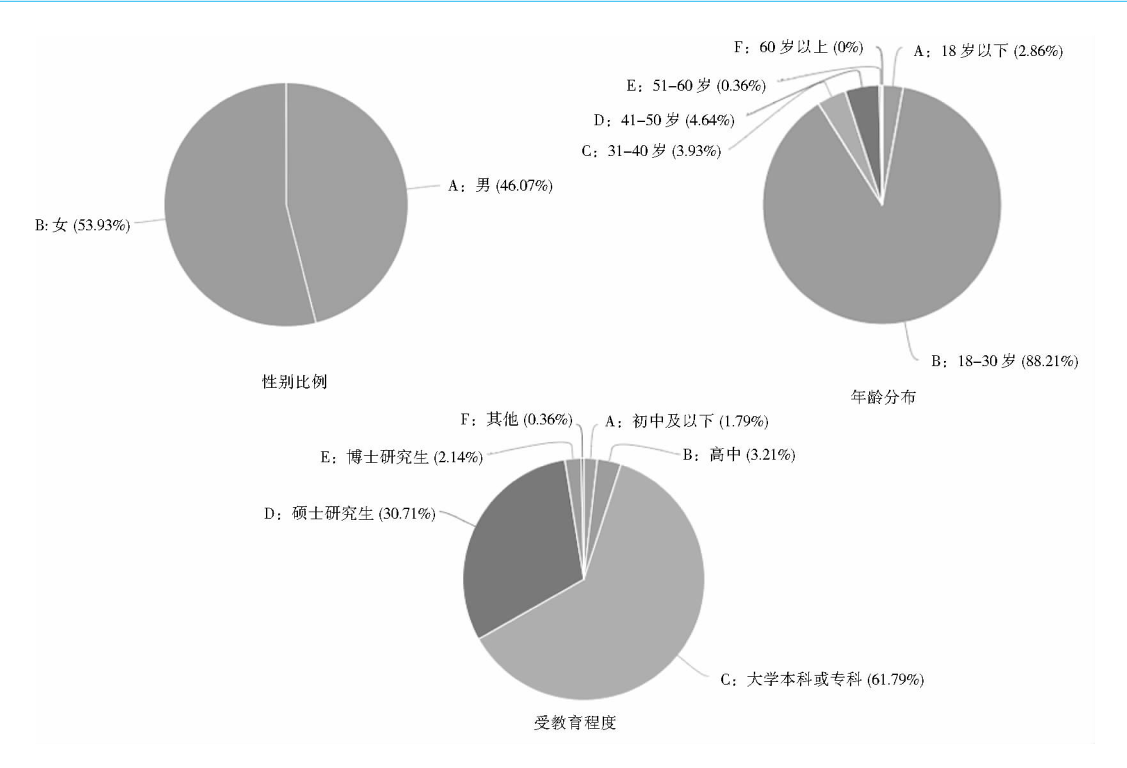


图 2　样本特征分析

平均数越大说明被调查者对问卷中涉及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的影响因素越认同。标准偏差值越大说明被调查者之间对相关因素影响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的程度存在的意见分歧越大，一般认为标准偏差小于 1 时，被调查者的意见一致性较高。各个影响因素中，“形式独特性”这一影响因素的平均值最小(3.46)，其他影响因素的平均值均大于 3.46，且接近一半的影响因素的平均值大于 4，这充分说明被调查者对观测变量都十分认同。从各个影响因素的标准偏差来看，只有 1 个影响因素的标准偏差大于 1，即“内容可靠性”为 1.103，说明不同的被调查者对该影响因素的认同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他影响因素的标准偏差均小于 1，表明被调查者对表 2 中提取的影响因素的认可度比较一致。因此，从整体调查结果来看，相关影响因素的提取是比较合理的。

4.3　数据分析与检验

本研究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图 1 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的影响因素假设模型进行数理分析与检验。通过对收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对图 1 的假设模型进行修正，旨在得到一个更符合实际传播情况并得到受众认可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集合。

4.3.1　信度分析

本研究运用 SPSS 24.0 软件，利用 Cronbach α 系数对问卷的可靠性与有效性进行检验，Cronbach α 系数值越大，表明观测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程度越高，变量的检测结果见表 3。整个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40，大大超过 0.7 的可接受值，说明本次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各个影响因素指标的内部一致性较高，可以对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的假设模型进行接下来的分析。

表 3　观测变量的可靠性统计

Cronbach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 Alpha	项数
0.940	0.942	32

4.3.2　适用性测量

在因子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因子分析适合性检验。本研究运用 SPSS 24.0 软件，采用 KMO 样本测度和巴特利球形检验来进行因子分析适合性的评估，评估结果见表 4。KMO 检验值为 0.930，大于 0.5，达到“良好”的标准，表明变量间具有共同因素存在，非常适合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 4 237.258，自由度为 496，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 0.000，小于 1%，再次表明样本数据适用于因子分析。

表 4　KMO 与 Bartlett 检验

检测项		数值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930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4 237.258
	自由度	496
	显著性	0.000

4.3.3 主成分分析

本研究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萃取公因子，以特征值大于 1 为标准截取数据，共获得 7 个公因子，结果显示这 7 个公因子的 Cronbach α 系数均大于 0.7，累计方差解释度为62.320%（见表 5），这表明其可以较好地代表原始变量信息。

表 5 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	11.552	36.099	36.099	11.552	36.099	36.099	3.904	12.201	12.201
2	1.809	5.653	41.752	1.809	5.653	41.752	3.114	9.732	21.933
3	1.626	5.082	46.834	1.626	5.082	46.834	3.038	9.493	31.426
4	1.510	4.720	51.553	1.510	4.720	51.553	2.691	8.409	39.835
5	1.289	4.027	55.580	1.289	4.027	55.580	2.627	8.211	48.046
6	1.124	3.513	59.093	1.124	3.513	59.093	2.516	7.862	55.907
7	1.033	3.227	62.320	1.033	3.227	62.320	2.052	6.413	62.320

在因子分析过程中，根据旋转成分矩阵可以确定公因子，对公因子上载荷系数绝对值小于 0.45 的影响因素予以剔除，得到观测变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6。本研究对样本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的旋转成分矩阵是根据被调查者对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分析得出的，与假设模型存在一定差异。原假设模型 32 个观测变量对应的 5 个维度变成现在的 7 个维度，并且每个维度包含的变量与最初的假设模型略有不同，表明最初的分类标准存在不足之处，没有得到完全验证，需要继续完善和修正假设模型。

表 6 观测变量因子分析载荷矩阵

影响因素	成分						
	1	2	3	4	5	6	7
传播主体人员投入	0.695						
传播主体推广能力	0.672						
传播媒介影响力	0.662						
传播主体经费投入	0.658						
传播主体传播意识	0.547						
传播受众信息需求		0.715					
传播受众信息素养		0.713					
传播受众基本特征		0.623					
传播受众再传播行为		0.622					
传播受众利用习惯与兴趣		0.599				0.521	
传播媒介易接受性			0.670				
传播媒介易用性			0.645				
传播媒介互动性			0.619				
传播媒介易获取性			0.579				
传播媒介安全性			0.529				
传播媒介功能性			0.452				
形式独特性				0.819			
形式多样性				0.616			
趣味性				0.590			
创新性				0.535			
时效性				0.472			
内容有用性					0.697		
内容可靠性					0.679		
内容丰富性					0.670		
内容结构性					0.576		
内容完整性					0.550		
政策法规环境						0.756	
社会文化环境						0.742	
信息技术水平						0.512	
易理解性							0.629
传播主体影响力							0.521
社会性							0.474

4.4 模型修正

由表 6 可知,有部分因子载荷结果与原假设模型存在差异,需要对 7 个公共因子进行重新归纳和命名,进而确定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的影响因素。

根据旋转成分矩阵,公共因子 1 上共有 5 个变量,基本包括假设模型中"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主体"的全部影响因素指标(传播主体影响力除外)和传播媒介影响力,与假设模型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由于传播媒介影响力也可以理解为传播主体所选择媒介的影响力,媒介影响力与传播主体的主观选择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可以将"传播媒介影响力"重新定义为"传播主体媒介选择"。公共因子 1 的这些变量是对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主体的反映,揭示包括编纂机构和编纂人员在内的传播主体因素对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的重要影响,因此将公共因子 1 命名为"成果传播主体"。

载荷到公共因子 2 上的变量共有 5 个,包括传播受众信息需求、传播受众信息素养、传播受众基本特征、传播受众再传播行为、传播受众利用习惯与兴趣,涵盖假设模型中"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受众"的全部指标,与原假设模型吻合。这些因素均为受众本身固有的特征、需求和行为等属性,因此将因子 2 命名为"成果受众属性"。

载荷到公共因子 3 上的变量共有 6 个,主要包括传播媒介易接受性、传播媒介易用性、传播媒介互动性、传播媒介易获取性、传播媒介安全性、传播媒介功能性,基本涵盖假设模型中"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媒介"的全部指标,因此本研究依然将因子 3 命名为"成果传播媒介"。

载荷到公共因子 4 上的变量共有 5 个,包括形式独特性、形式多样性、趣味性、创新性、时效性,这些变量均是从档案文献编纂成果自身表现出的外在因素解释了对其传播的影响,因此可以将因子 4 命名为"成果外在特征"。

载荷到公共因子 5 上的变量共有 5 个,主要包括内容有用性、内容可靠性、内容丰富性、内容结构性、内容完整性,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变量均揭示了档案文献编纂成果自身的内容质量,可以将因子 5 命名为"成果内容质量"。公共因子 4 和因子 5 基本涵盖假设模型中"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全部指标(社会性和易理解性除外),但是基于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角度发现,被调查者认为档案文献编纂成果自身的外在特征因素对其传播的影响更大。

载荷到公共因子 6 上的变量共有 3 个,包括政策法规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信息技术水平,涵盖了假设模型中"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环境"的全部指标,与原假设模型完全吻合,因此继续将因子 6 命名为"成果传播环境"。

载荷到公共因子 7 上的变量共有 3 个,包括易理解性、传播主体影响力、社会性,与假设模型存在差异,主要涵盖了档案文献编纂成果自身的两个因素和传播主体影响力。本研究认为这 3 个因素均是面向传播受众的,是从受众感知的角度聚类的,因为易理解性是基于受众对成果的理解程度,传播主体影响力也是指编纂机构和人员对受众的影响力和获得的受众关注度,社会性则是指档案文献编纂成果面向的受众数量,因此可以将因子 7 命名为"成果受众感知"。

根据上述分析及重新归纳命名之后,得到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七大影响因素,体系模型见图 3。

由图 3 可知,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模型主要分为 7 个维度,每个维度通过多个观测变量进行反映。可以看出,本研究构建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模型契合申农通讯系统模型的核心思想,其中的成果传播主体即信源,成果传播媒介即信道,成果受众属性和成果受众感知对应信宿,成果内容质量和成果外在特征对应信息资源。申农的通信系统模型针对信息传递过程,简要说明了通信系统中信源、信道、信宿等诸要素的作用,并科学模拟了通信系统的结构与功能[33],而如图 3 所示的模型同样涵盖信源、信道、信宿等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扩展出信息要素和传播环境要素,使模型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为进一步验证模型,接下来对修正后的 7 个维度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见表 7。各个影响因素维度的 α 系数均超过 0.7,说明每个影响因素维度所包含的若干影响因素间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信度较好。另外,尽管"成果传播环境"和"成果受众感知"两个维度所包含的观测变量数目较少,其 KMO 值均接近 0.7,说明这两个维度所包含的观测变量也可以比较好地反映因子特征,而剩余 5 个维度的 KMO 值均大于 0.7,说明 7 个维度的观测变量都可以较好地反映因子特征[37]。综上所述,修正后的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模型较为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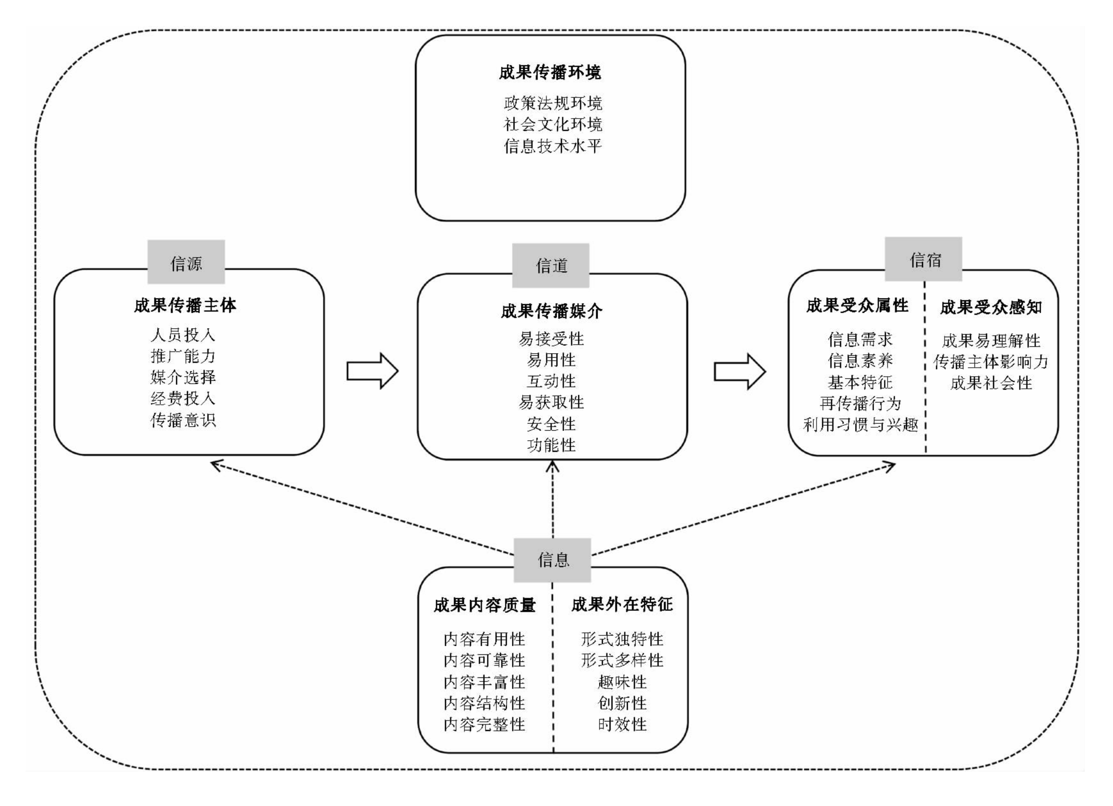


图3　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模型



表7　修正后模型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影响因素维度	观测变量数目	α 系数	KMO 值
成果传播主体	5	0.847	0.838
成果受众属性	5	0.833	0.809
成果传播媒介	6	0.842	0.869
成果外在特征	5	0.752	0.777
成果内容质量	5	0.766	0.752
成果传播环境	3	0.754	0.686
成果受众感知	3	0.708	0.674

5　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结合拉斯韦尔5W理论，通过实际数据调研与因子分析，构建了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模型。该模型与申农通信系统模型相契合，较为全面、客观地分析探讨了影响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的相关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1）在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的诸多影响因素中，成果传播主体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成果传播主体包括传播主体人员投入、传播主体推广能力、传播主体媒介选择、传播主体经费投入、传播主体传播意识等影响因素，其中传播主体人员投入和传播主体推广能力的因子载荷位居前两位，这体现出编纂机构对编纂成果传播过程的人员支持力度以及编纂人员自身推广编纂成果的能力是影响编纂成果传播最重要的因素。传播主体媒介选择也是影响编纂成果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编纂机构和人员所选择媒介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会对传播效果产生直接作用。此外，传播主体经费投入和传播主体传播意识也是影响编纂成果传播的最重要因素的一部分，这映射出编纂机构的经费支持力度和编纂人员自身传播编纂成果的意识对编纂成果传播过程的重要影响。与其他信息产品相比，编纂成果的传播更需要发挥传播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加大人力投入和经费投入，选择用户易于获得和接受的媒介渠道，提高传播意识和推广能力。

（2）成果受众属性是影响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的第2个重要方面。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传播受众信息需求、传播受众信息素养、传播受众基本特征、传播受众再传播行为的因子载荷都大于0.6，说明在成果受众属性这一维度中，被调查者认为这4个影响因素更为重要。可以看出，受众的信息需求和信息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编纂成果传播的范围和效果；受众的年龄、职业、受教育水平等基本特征会影响受众传播不同类型编纂成果的选择；受众的再传播行

为则会进一步影响编纂成果传播的广度。此外，受众的利用习惯与兴趣也是影响编纂成果传播的主观因素之一。在传播编纂成果的过程中，应以受众需求为导向，前期进行全面调研，准确了解受众的基本特征、习惯和兴趣，并鼓励受众的再传播行为。

（3）成果传播媒介是影响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的第 3 个重要因素，主要包括传播媒介易接受性、传播媒介易用性、传播媒介互动性、传播媒介易获取性、传播媒介安全性、传播媒介功能性 6 个影响因素。媒介是人的延伸[38]，是沟通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桥梁，因此传播媒介对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传播有重要影响。从因子载荷上看，被调查者认为传播媒介的易接受性、易用性和互动性对编纂成果传播的影响更为重要，传播媒介的易获取性和安全性的重要程度次之，传播媒介的功能性则对编纂成果传播的影响较弱。这要求编纂人员在选择传播媒介时，应首先考虑媒介的易接受性和易用性，并加强与成果受众的互动。

（4）成果外在特征是影响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包括形式独特性、形式多样性、趣味性、创新性、时效性等影响因素。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形式独特性的因子载荷为 0.819，这在所有影响因素中是最大的，当前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主要通过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形式传播，如果能够采用其他独特的形式（例如虚拟现实技术）将极大地促进编纂成果的传播；形式多样性能够满足受众对编纂成果多元化的信息需求，从而扩大传播范围；具有趣味性和创新性的编纂成果则能够引起受众的兴趣，使之享受利用过程，从而提升传播效果；时效性是从时间维度上衡量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价值，时效性强的编纂成果在一定时间内具有较好的传播效果。被调查者认为编纂成果的外在特征因素对其传播的影响相比于内容质量因素更大，这要求编纂人员除了注重成果的内容质量外，还需要特别注重成果外在形式的独特性、多样性、趣味性等。

（5）成果内容质量是影响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的又一重要因素，涵盖内容有用性、内容可靠性、内容丰富性、内容结构性、内容完整性 5 个影响因素，体现了当下编纂成果传播受众对成果内容方面的基本要求。编纂成果内容质量是实现编纂成果价值的核心因素，会影响受众对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价值的判断和认可，也是受众利用编纂成果信息资源的基础。内容有用性能够满足和匹配受众的信息需求，有助于受众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内容可靠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之一，档案内容的真实可靠始终是受众利用档案的重要原因；内容丰富性可以满足受众多样化的信息需求；内容结构性和内容完整性则反映了编纂机构和人员对档案内容的组织整理水平。

（6）成果传播环境是影响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的客观因素，包括政策法规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信息技术水平等影响因素。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传播环境，但不论时代如何变化，这 3 个因素对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传播都有直接影响。稳定的政策法规环境和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能够促进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传播，而信息技术水平与编纂成果传播的关系在数字时代变得更加密切，对传播的影响也更为重要。因此，成果传播环境也是影响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传播编纂成果应充分利用数字时代的信息技术，并对编纂成果传播环境进行分析，利用政策法规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有利条件促进成果传播。

（7）成果受众感知是影响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涉及成果易理解性、传播主体影响力、成果社会性 3 个影响因素。因子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因素会对数字时代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产生影响，只是在影响程度上，总体排序相对靠后，但是相关影响因素的因子载荷却并不低，这表明在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过程中受众对成果本身和传播主体的感知也是影响编纂成果传播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体现出受众是传播活动中极为活跃的因素，具有重要地位。受众自身属性因素会影响其主动选择信息产品的过程，但编纂成果的传播不能仅仅依靠受众的主动选择，还要编纂人员主动传播使受众知晓。

数字时代为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本研究基于档案学、传播学、统计学的相关理论，构建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数字时代影响编纂成果传播的因素，并对这些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和描述，体现了受众对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效果的期望和诉求。对这些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和探讨将有利于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帮助编纂机构和人员在数字时代更精确地提升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传播力。

参考文献：

[1] 邵培仁. 传播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 胡鸿杰.档案文献编纂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 朱莉.档案文献的选择性传播与档案编研[J].图书情报知识,2000(3):48-49.
[4] 苏君华,龙家庆.档案文化产品传播影响力研究——以档案编纂成果为例[J].档案学通讯,2018(4):35-40.
[5] 管先海,程训方.网络传播的影响与档案信息传播的发展趋向[J].档案管理,2003(6):23-24.
[6] 韩宝华.构建档案信息传播学刍议[J].档案与建设,2008(9):6-7.
[7] 曾莉陈.大众文化传播视野下的档案文献编纂理念研究[J].北京档案,2010(8):17-18.
[8] 郑慧玲.从传播学角度探析档案编研工作[J].兰台世界,2007(4):8-9.
[9] 于元元,徐丹丹.论档案编研成果的跨屏传播策略[J].兰台世界,2016(11):8-10.
[10] 余雅榕.基于5w传播模式的档案编研社会化探析[J].山西档案,2017(3):44-47.
[11] 孙丽娜,郑晓雯.图书馆虚拟参考咨询服务在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上的应用[J].云南档案,2013(4):27-29.
[12] 相甍甍,王晰巍,郭顺利.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情报,2018,38(3):37-44.
[13] 赵蓉英,曾宪琴.微博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研究分析[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4,37(3):58-63.
[14] 柯赟.新浪微博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效果预测[J].现代情报,2016,36(3):22-26.
[15] 闫奕文,张海涛,王丹,等.信息生态视角下政务微信信息传播的关键影响因素识别研究[J].情报科学,2017,35(10):109-115,124.
[16] 李海田,孙志坚.基于军队科普的装备科技信息传播影响因素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8,41(12):114-117,113.
[17] 张炜南.网络虚假信息传播影响因素对比分析[J].中国信息安全,2018(9):91-94.
[18] 李中梅,张向先,郭顺利,等.新媒体环境下智库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研究[J].现代情报,2018,38(7):25-35.
[19] 刘行军,甘春梅,王伟军.基于U&G理论的微博信息传播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情报科学,2016,34(3):139-144.
[20] 纪慧生,蔡东妮.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影响因素分析[J].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19(4):107-115.
[21] 邓君,王阮,盛盼盼.用户感知视角下档案网站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8(4):62-71.
[22] 孙彦波,陈达.基于自媒体的网络政务信息传播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情报,2018,38(5):87-93.
[23] 廖海涵,王曰芬.社交媒体舆情信息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研究——以新浪微博“8.12天津爆炸”事件为例[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6(12):85-93.
[24] 郑昱.突发公共事件中舆论信息传播倾向的影响因素——基于民众负性情绪的研究视角[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7,40(7):80-87.
[25] LIU L,CHEN B,AI C,et al.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 factors o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mobile social network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WeChat[J]. ISP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2018,7(5):189.
[26] SHAN S,LIU M,XU X. Analysis of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az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behavior and motivation in WeChat[J]. Information discovery and delivery,2017,45(1):21-29.
[27] DONG J,CHEN B,LIU L,et al. The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on cascade size distribution in social networks[J]. IEEE access,2018(6):54185-54194.
[28] LIU X,HE D,YANG L,et al. A novel negative feedback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model based on online social network[J].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2019,513:371-389.
[29] NAVARRO-GALERA A, ALCARAZ-QUILES F J, ORTIZ-RODRIGUEZ D. Onlin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on sustainability in regional governments: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factors[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6,33(1):53-66.
[30] GUINE R P F,FERNANDES S R. Cluster analysis to the factors related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healthy eating in a school population of young adolescents[J]. Current nutrition & food science,2016,12(2):80-89.
[31] LASSWELL H.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M]. New York:Harper&Bros,1948.
[32] 樊丽,吴晓东.用传播意识拉动文化消费[J].新闻世界,2012(8):248-249.
[33] 柯平,高洁.信息管理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34] 范江怀.二次传播:纸质媒体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也谈报网融合[J].军事记者,2012(5):10-12.
[35] 冯俊华.企业管理概论[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36] 宋雪雁,管丹丹,张祥青,等.基于服务接触的电子政务门户网站知识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23):22-31.
[37] 宋雪雁,朱立香,房梦莎,等.公共档案馆微信公众平台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1):15-23.
[38] MCLUHAN M.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M]. Cambridge:MIT Press,1995.

作者贡献说明:
孙振嘉:确定选题,修改论文;
崔浩男:收集论文资料,撰写论文,分析和处理数据;
宋雪雁:确定选题,提出论文研究框架,修改论文;
邓君:确定选题,修改论文。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 Compilation Products in the Digital Age

Sun Zhenjia　Cui Haonan　Song Xueyan　Deng Jun
School of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2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a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 compilation products,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 compilation products.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Lasswell 5W model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hypothetical influencing factors model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 compilation products, and used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method to test and correct the hypothetical model, and discussed the revised influencing factors model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 compilation products. [**Result/conclusion**] It constructs a influencing factors model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 compilation products which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hannon communication system model, and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composi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 compilation products. The 32 influencing factors mainly divided into 7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content quality of the products, the external features of the products, the dissemination main body of the products, the dissemination media of the products, the attributes of the products audience, the perception of the products audience, and the dissemination environment of the products.

Keywords: archival document compilation　compilation product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ssemination

2017－2019 年度《图书情报工作》优秀论文

本刊自 2014 年起发布当年及前两年高被引论文 TOP10。2019 年,《图书情报工作》仍延续上一年的评选方式,评选过去 3 年发表的高被引和高下载论文,以各年 TOP50 为基础,兼顾发表时间,由编辑部最后选定 20 篇进行公布。2017－2019 年度《图书情报工作》优秀论文如下:

序号	题名	作者	发表时间
1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政策问题的构建	黄如花,温芳芳	2017,61(20)
2	融合主题与情感特征的突发事件微博舆情演化分析	安璐,吴林	2017,61(15)
3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用户流失行为模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郭顺利,张向先,相甍甍	2017,61(2)
4	手机游戏用户粘性影响机制研究:整合 Flow 理论和 TAM 理论	段菲菲,翟姗姗,池毛毛等	2017,61(3)
5	细粒度情感分析研究综述	唐晓波,刘广超	2017,61(5)
6	基于科研众包模式的公众科学项目运作机制初探——以 Evolution MegaLab 为例	牛毅冲,赵宇翔,朱庆华	2017,61(1)
7	网络健康社区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研究	张克永,李贺	2017,61(5)
8	美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发展现状及启示	张雅琪,柯平	2017,61(22)
9	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合理性审视	范并思	2017,61(23)
10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述评	周亚,许鑫	2017,61(2)
11	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用户错失焦虑症(FoMO)的研究回顾与展望	赵宇翔,张轩慧,宋小康	2017,61(8)
12	美国、欧洲、日本、中国数字素养培养模式发展述评	许欢,尚闻一	2017,61(16)
13	虚拟社区用户知识付费意愿实证研究	方爱华,陆朦朦,刘坤锋	2018,62(6)
14	高校移动图书馆用户画像构建实证	陈添源	2018,62(7)
15	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建设与发展趋势展望	王宇,孙鹏	2018,62(2)
16	互联网思维下图书共享模式研究	赵琰,戴晓翔,詹庆东	2018,62(3)
17	新时代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新定位与新认识——“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2017)”侧记与思考	初景利	2018,62(1)
18	网络舆情信息传播动力机制的比较研究	曾润喜,陈创	2018,62(7)
19	数据驱动下数字图书馆用户画像模型构建	许鹏程,毕强,张晗等	2019,63(3)
20	人工智能在图书馆应用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展望	杨九龙,阳玉堃,许碧涵	2019,63(4)